

笔谈

哈迪·梅里曼

许田波

王天成

苏利利

裴毅然

陶业

中国民主季刊

第2卷 第2期

2024年4月

CC-BY-NC-ND

自由、免费转载分发，但须注明  
作者与出处，并不得修改及商用

# 中国民间暴力 思想的兴起

**编按：**从世界范围看，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当属规模最大的非暴力行动之一。当时参与者普遍认为必须坚持非暴力，维持了良好的非暴力纪律。它的被残酷镇压，在无数人们心中造成了巨大冲击，包括质疑非暴力在中国的可行性。特别是近10多年来，随着许多人对改革期待的破灭，主张暴力反抗的人显著增多。

因而，距天安门民主运动35年之后的今天，活动分子、网络评论人士仍在激烈地争论着暴力与非暴力的问题。争论既发生在国内外许多私下谈话中，也发生在有言论自由的海外网络平台上，例如推特(X)。主张暴力的人认为，非暴力只适合于统治者相对更仁慈或有某种自由民主的国家。主张非暴力的人经常会遭到“围攻”，他们的人格、动机甚至也被质疑贬损。

民间暴力思想兴起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暴力主张者们所说的“暴力”究竟指的是什么，是民间武装起义、军人的政变还是其他，其中的问题何在？他们所持的理由，从世界范围人类自由事业的经验看，是否成立？非暴力只适合于统治者仁慈或有某种自由民主的国家，这种看法的盲点何在？“非暴力不适合中国”，是否对1989年民主运动失败教训的正确总结？如何增强人们对非暴力抗争的信心，为有效地在中国开展非暴力抗争奠定必要的思想、认知基础？

《中国民主季刊》约请部分国内外专家、活动人士，进行了以下笔谈。简短的一组笔谈，对于讨论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自然是远远不够的。我们的期望主要不在提供答案，而在促进进一步讨论。理清思路，是有效行动和最终成功的前提。



哈迪·梅里曼（Hardy Merriman，国际非暴力冲突研究中心总裁、大西洋理事会高级研究员）：反对专制统治的重任，往往完全在生活于暴政之下的人民肩上。当其他选择，例如，依靠选举、法律制度、谈判、第三方干预，或者是寄希望于政府的改革，都未能改善人们的生活境况时，人民常常会做出这个命运攸关的决定，即奋起反抗。

如何反抗至关重要。如果他们选择暴力，那会将他们置于一种特定路径，而如果他们选择非暴力，这将使他们走上另一条不一样的路。他们也可以选择同时采用暴力和非暴力，但这两种战略往往会以不同的方式发挥作用，可能使抵抗运动朝着截然相反的方向发展。

暴力反抗的倡导者通常争辩说，独裁者只能听懂以暴力对他们说话，因此这类政权往往只会对暴力有所反应。他们还可能说，非暴力不会对极其残暴的政府有效；而且即使非暴力反抗可能有效，但相比之下，暴力反抗也能更快地推翻独裁政权。

倡导非暴力反抗的人可能会反驳说，反抗运动诉诸暴力是在专制政权最擅长的方面与之搏斗，而那正是应该避免的。因为独裁政权深谙暴力，有使用暴力的强大能量，因此，我们应该采用公民抵抗 (civil resistance) 的方式反抗，如罢工、抵制、不合作以及其他非暴力方法，这些都是独裁政权难以轻易控制的抗争方式。此外，非暴力反抗的倡导者可能还会指出，许多专制政权，包括中国当前的政权，往往是在武装斗争之后出现的，而非暴力运动则更有可能导致民主。

迄今的研究对于评估上述争论，提供了哪些有价值的信息？我想到的是以下几个要点：

首先，回顾过去一个世纪，非暴力民间抵抗运动已经成为挑战专制、推动全球民主化进程的最为强大的力量之一。<sup>1</sup> 研究表明，非暴力抵抗运动导致政治转型的可能性，要比暴力起义高将近两倍。并且，公民抵抗驱动的政治转型结出长期稳定民主果实的可能性，要高 2.5 到 9.5 倍。<sup>2</sup>

非暴力抵抗能够对抗并打败残暴的政权。<sup>3</sup> 这些运动所反抗的专制政权，往往与暴力起义所面对的专制政权同样残酷。<sup>4</sup>

非暴力抵抗所导致的公众参与平均而言大约是暴力起义的 11 倍。<sup>5</sup> 这意味着它们往往更具包容性，能更广泛地将权力分散到社会中去，而这也意味着会对民主化结果产生积极影响。

非暴力抵抗产生作用的速度（平均 3 年），是暴力起义（平均 9 年）的三倍左右。<sup>6</sup>

第五，研究强烈表明，运动的战略选择和参与者技巧是其成败的重要决定因素。<sup>7</sup> 简言之，好的战略、战术和行动技能，能够使运动克服不利条件而取得成功。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因为技能和战略选择的水平，是可以通过培训和其他能力建设计划而提高的。

我非常敬佩那些挑战独裁、追求民主的人们。作为局外人，我不应该指导人们该怎么做。每个社会都有其独有的特征，再加上长期遭受独裁政权蹂

蹒的经历，可能会导致人们得出不同的结论。不过，我在此分享一些基础的研究发现，以便持有不同政见的人们能从已有的关于暴力和非暴力不同影响吸取经验教训，在做出选择时借鉴。没有一个选项能够确保成功。虽然在政治领域和生活中，我们经常面对的是种种不令人满意的选项，但我们仍然必须选择那个由最高成功机率的、促进我们的目标的做法。（阿依登珉 翻译）



许田波 (Victoria Hui, 美国圣母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我借鉴已故的查尔斯·蒂利 (Charles Tilly) 及其他学者和实践者的著作，在世界各地教授了近二十年的非暴力和暴力运动。<sup>8</sup> 每一次运动都始于和平行动。那些转向暴力的人总是得出“非暴力已经让我们失望”的结论。让我简要阐述一下对这种具有普遍性的情绪的看法。

人们经常以为，非暴力只对“不那么残酷”的政权有效，比如对抗英国的印度民族独立运动，和抵制吉姆·克劳法 (Jim Crow law) 的美国民权运动。然而，经历过 1919 年阿姆利则 (Amritsar) 大屠杀和 1930 年达拉萨纳 (Dharasana) 盐场的残酷殴打的印度人，以及在美国南方目睹种族私刑的黑人们，不会理解这种言论。值得注意的是，莫迪今天尊崇的是苏巴斯·钱德拉·鲍斯 (Subhas Chandra Bose)，而不是甘地 (Ghandi)。<sup>9</sup> 鲍斯坚信“英国人永远不会和平地离开印度，必须通过武力驱逐他们”。<sup>10</sup> 他寻求德国和日本的帮助，招募原英属军队里的印度人战俘，组成了印度国民军。麦尔坎·艾克斯 (Malcom X) 与马丁·路德·金 (Martin Luther King) 之间的路线之争更是广为人知。

南非的反种族隔离斗争，最能说明以非暴力和暴力对抗非常残酷的政权的逻辑。纳尔逊·曼德拉 (Nelson Mandela) 在《漫漫自由路》中声明：<sup>11</sup> “只要非暴力抗议有效，我就呼吁使用它。” 1960 年的夏普维尔 (Sharpeville) 大屠杀，突显了非暴力手段是“一种无效的战略”，因此，暴力被认为是“唯一能够摧毁种族隔离的武器”，从而催生了军事组织“民族之矛 (MK)”。曼德拉宣称：“如果现有的破坏未能产生我们想要的结果，我们就准备进入下一个阶段：游击战和恐怖主义。” 曼德拉因此迅速被捕并被判处无期徒刑。MK 在流亡中幸存下来，但面对着“非洲大陆上最强大的军事机器”，在南非国内，它最终被彻底根除了。而且，MK 几乎没有机会从外部进行入侵。<sup>12</sup> 与此同时，在 1980 年代，一批新一代的领导人在黑人为主的郊区或城市中成长起来，他们组织了持续的消费者抵制运动。这一运动赢得了白人企业主对黑人诉求的支持，这些企业主后来为更具自由思想的德克勒克 (de Klerk) 的当选做出了贡献。

我来自香港，我认为将香港争取民主自由的运动与南非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进行比较，是有启发意义的。2019 年 7 月 1 日，抗议者闯入立法会后，他们有个口号引起了广泛的共鸣：“是你们（特首 / 当局）教育了我们认识到和平游行无济于事。” 香港人对非暴力的理论和实践了解不足，这是不幸的。香港人将非暴力等同于几十年来一直实践的半日游行。库尔特·肖克 (Kurt Schock) 在《非暴力行动及其误解》中指出，非暴力并非“被动抵抗”，而是积极主动的行动；它也不是纯粹的和平主义，而是战略性的选择，其成功的几率更高；非暴力行动也不是自发的人民力量，而是需要计划和战略化的。<sup>13</sup>

埃里卡·切诺维斯 (Erica Chenoweth)、玛丽亚·斯特潘 (Maria Stepan)、

吉恩·夏普 (Gene Sharp) 等倡导者指出，大规模示威往往不是最有效的方法；<sup>14</sup> 实际上，它往往是最具自毁性的方法，容易导致像 1989 年北京一样的大屠杀。<sup>15</sup> 相比之下，分散的方法，特别是抵制和罢工，既不容易立即被逮捕和殴打，又更有可能给政权带来损失。事实上，当局似乎更担心抵制和罢工。2019 年 8 月，在第一批汽油弹被投向警察阵线之前，北京的港澳办谴责 8 月 5 日的总罢工是“对公共秩序和法律的激进违规行为，挑战了‘一国两制’的底线和国家尊严。”<sup>16</sup> 另一位发言人抨击了抵制活动，称其意图是“瘫痪香港政府，夺取城市治理权，并使‘一国两制’成为空洞的概念。”中联办主任骆惠宁后来嘲讽称，2020 年 1 月医护人员的罢工是一种“政治性的冠状病毒”。

中国当局懂得暴力和非暴力的战略逻辑，并早就制定好了一套证明有效的应对战略，这就越发不利了。<sup>17</sup> 如果非暴力行动具有很高的成功机会，政权就会煽动暴力来削弱反对运动的影响力。仅仅通过拒绝让步，就很容易让抗议者普遍得出“非暴力已经失败了”的结论。于是，激起反抗者的暴力也相对容易。抗议者最终能于 2019 年 7 月 1 日闯入立法会大楼，部分原因是警方神秘地消失了。此外，如果政权的暴力行为始终意在激怒并导致反对派激进化，那么香港警方在当地和国际媒体直播的情况下对抗议者的残酷殴打，则收到了挑起抗议者的暴力反应、削弱了抗议者抵抗能力的效果。

令人真正感到悲伤的事实是，抵抗政权的各种尝试变得越来越无效。这个世界上的活动人士们相信是政权的镇压行为正当化了反对派的暴力。非暴力运动的倡导者们则认为，政权的镇压并不改变非暴力抵抗是有效的这一事实。最削弱反对派的，是政权的能力。即使在天安门事件的残酷镇压之后，

党国体制也无法完全控制每个人的行动，因此许多在通缉名单上的人都能够逃脱。随后，中国发展成为全球最复杂的监控国家。任何形式的抵抗都需要有组织的计划和执行，但在当前中国的情况下，抵抗者的活动几乎无法实现这种组织化。然而，如果抗议再次爆发，抗议者最好坚持非暴力的纪律，拒绝被诱使转向暴力。正如曼德拉最终认同的那样，“国家比我们强大得多，我们任何暴力行为都将受到毁灭性的打击”，这使得非暴力“成了一种实际上的必要”。中国官员对罢工和抵制的谴责以及煽动暴力表明，他们最担心的是非暴力抵抗。（阿依登珉 翻译）



王天成（《中国民主季刊》主编、原北大法学院讲师）：

异议群体中暴力思想的流行令人不安。暴力其实比非暴力反抗更加困难、更不容易成功，但是其鼓吹者们似乎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而他们的话语却以日复一日地打击对非暴力反抗的信心为代价。更远一点看，将来发生大规模非暴力反抗的时候，这种混乱的思想状态很可能会增加维持非暴力纪律的困难，因而降低反抗的成功机率。<sup>18</sup>

暴力论盛行的一个原因，在于对自己一方暴力能力不切实际的想象。暴力论者们认为统治者的暴力必须以暴力来回答，因为暴力与暴力才是彼此真正对等的力量。但是，一个明显的问题是，如何获得枪？在中国刑法中，买卖、私藏枪支是可以判死刑的重罪。姑且不论这一限制，假使能获得某些枪支，又如何组织、训练一支足以能击败政府军的武装力量？

暴力正是专制政府之长、民众之短。以己之短、攻彼之长，并不是一种好的战略设想。



为了坚持自己的观点，暴力论者们经常提到军事政变<sup>19</sup>。然而，军事政变通常并不是民间所能操作的。当我们谈论反抗的时候，应该问自己能做什么，而不是等待某个或几个将军来拯救我们。军事政变即使发生，其前景也远比想象的复杂得多。从历史看，军人的许多政变是为了推翻民主或取代旧的统治者，建立民主的事例少得可怜。

非暴力与暴力的确明显不对等。这正是困惑暴力论者们的一团迷雾。他们因而将非暴力定性为软弱的，没有兴趣去深入了解其对于争取自由的巨大潜力和作用原理。

哈迪·梅里曼 (Hardy Merriman) 先生在前面提到，从全球范围看，非暴力运动在推动政治转型上的成功率要比武装起义高出两倍。

这个数字是 1900 至 2019 年 120 年的统计结果<sup>20</sup>。晚近的数据更加惊人：从 1970 年代到上世纪末，也就是在著名的第三波民主化期间，80 余个政治转型中约 70% 非暴力抗争起了关键作用。<sup>21</sup> 人类进入现代世界后，斩木已不足以为兵，民众与政府之间在武力上，日益不可挽回地极度不对等。在这种大背景下，非暴力行动发展成为争取自由的最主要手段。

与寻求对等的、以暴力对抗暴力的传统思路不同，非暴力抵抗是一种迂回的反抗方式。它不是直接攻击对方最强之点，而是从对方最弱之处入手。

影响了 20 世纪共产国家命运的哈维尔，曾意味深长地提出“无权者的权力”<sup>22</sup>。我想在这里略微补充一点，即“有权者的致命弱点”。非暴力之所以是一种能击败独裁者的强大力量，从根本上说，就是因为这一弱点。

所有独裁者及其政权都必须依赖于人们的服从、合作与支持。无论他们及其政权多么强大，他们的权力并非来源于自身。一旦人们克服恐惧，坚定地停止服从、合作和提供支持，他们就会失去权力，抵达穷途末日。

甘地早就发现了有权者这一致命弱点。他说：“人民若不服从，统治者就无法统治”。<sup>23</sup> 非暴力抗争在当代最重要的思想家基恩·夏普 (Gene Sharp)，将此称为专制者的“阿基里斯之踵”。<sup>24</sup>

这并不是一个很难发现的真理，却经常被忘记，更经常不被深信。缺乏深信，导致不愿去深入钻研这一反抗技术，以坚韧的努力不依靠暴力武器，而是通过削弱切断专制者、压迫者的权力来源最终击败他们。

这不是一个轻而易举的过程。没有想象的暴力革命“便餐”，也不会有非暴力革命“便餐”，虽然非暴力实际上更可行。

所谓“非暴力抗争不适合于中国”，“只适合于统治者较仁慈或有某种自由民主的国家”，是一个基于想象而非事实的判断。它只对反抗专制或压迫的非暴力斗争在一些国家的最终成功略知一二，而并没有了解那些国家的反抗运动所经历过的艰难曲折历程。如果去察看一些著名的案例，例如印度、波兰、捷克斯洛伐克、阿根廷、智利、南非等国家的案例，看看那些国家抗争的民众和领导者所经历的杀戮、毒打、监禁等种种迫害和反复挫败，你可能会重新评估自己的判断。

这个判断不只美化了世界其他地方的专制者或压迫者。它也在影响我们做好坚韧抗争的心理准备。它将一切都推给政治环境，完全忽视了战略、战术、

技巧的重要性，因而不利于提升抗争、使它变得更有效。

我们是否能摆脱这种前景，即任何寻求政治变化的非暴力行动，都最终会被镇压下去，而不会导致任何政治变化？这个问题横梗在许多人心头，非暴力倡导者们应该深入思考、给出回答。当然，回答必须是非暴力行动计划的关键内容之一。

反抗会遭到镇压，必须有这种心理预期。但镇压有不同程度和类型，我认为应该避免 1989 年那种大规模流血，因为那是许多人所不能承受的。另一方面，抗争开始后也要顶住镇压、威慑，使镇压归于无效。

当镇压失去效用，当参与达到足够大的规模、蔓延开来，当运动强大到难以镇压下去的时候，非暴力就开始变成了一种强迫性的力量。如果到了连军队也不愿保护独裁者的时候，他就只有倒台了。但这只是改变的契机来临的一种可能场景。

在相当长时间中，经常有呼吁、声明、联名上书和个案维权。这些都是非暴力的，但不要误以为它们就是非暴力抗争。我们所说的非暴力抗争要更激烈，它是一种冲突、对抗，一种强迫性的力量。说服可能是非暴力的一种效果，但达到强迫的程度才更有效。所谓“强迫”，就是违背对方意愿，对方不愿意也只能接受你的要求。

说到非暴力抗争，人们最先想到的似乎总是上街游行。但游行并不是惟一的、也未必是最有效的方法。抵制、罢工等不合作方法常常更有力量，也相对安全一些。基恩·夏普总结出了三大类和 198 种具体的非暴力行动方法。

虽然暴力已经谈了很多年，我们没有听见一声枪响。另一方面，非暴力行动却的确发生过，最著名的当然是1989年的天安门抗争和2022年底的“白纸运动”。但这两次大的行动都是自发性的，缺乏战略规划。我们需要转向有计划战略性抗争，从而使抗争变得更有效。

这就需要更好地理解非暴力行动的性质、潜力、作用原理、技巧和成功要求，学会制定战略计划。遗憾的是，许多活动分子迄今并不认为有学习的必要，在他们看来，非暴力行动似乎只是上街这种“简单”的事，没什么可学的。

这就好像一个想在将来指挥战争的人，并不认为有学习军事、兵法的必要。我们要改变中国，需要先改变自己。要改变自己，需要从知道不足开始。

**苏利利 ( 社会正义与社群参与工作者、研究者 )**：自六四屠杀以来，许多异见人士以零星、不涉及大规模公众动员的非暴力方式公开表达不满和抗议，这些勇者多遭到了残酷报复和迫害。反对阵营对抗争者表达了钦佩与同情，尽管在理论上对暴力与非暴力路径有分歧。但与此相反的是，普通公众通常不领情，几十年来，对非暴力抗争行为的批评一直不断。

笔者认为，这类批评背后的逻辑可能是：就零星抗争而言，非暴力还不如暴力有效。其判断本身并非主张暴力革命。批评者也知道的事实是：中国没有暴力革命，而且不具备发生的条件。

若考察公众行为即可看到：当有人因忍受不了不公而自杀、或行凶时，听闻者会说，“既然不怕死，为什么不去找个垫背的”，或者说，“冤有头债有主，出门左转是政府”，显然，这些都意在将零星的暴力反抗对比零

星的非暴力抗争，并认为后者无效。

本质上，用已故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查尔斯·蒂利 (Charles Tilly) 的“WUNC”四原则——价值、团结、人数和坚持<sup>25</sup>——来说，这些行动因不符合“有价值”的原则而不被公众接受。相信异见人士的亲朋好友也说过“你们成功不了”这样的话，这就是对公众舆论的折射。

另一方面，在定性上的“夸大”几乎是中国文化中的痼疾，因为中国至今没有引进源于西方自由主义的社会科学，而同时西方保守主义对自由主义的反对却大量通过民间渠道引入中文世界，因此，社会科学一直被认为是“无用之学”。正如自由主义被滥用一样，非暴力运动在尚未出现时就已经遭到了普遍反对。

当反对阵营用“非暴力运动”来描述零星的、自发的和针对个别事件的抗争行为时，这一原本有着明确定义的术语被赋予了不同的含义，它不再指政治理论中所说的非暴力运动。而术语的误用导致了主流群体普遍认为中国的反对运动不会成功的判断。如，“中国行动”等组织向社会公开征集的非暴力行动方案，有人在未阅读或理解的情况下，就评其“不切实际”、“隔靴搔痒”，因为人们认为那些只是“纸上谈兵”，即使实践也是失败。

因此，当反对行为未达到社会科学所定义的“运动”的水平时，反对阵营不要以“运动”去冠名或定性。将“抗争”与“运动”区分开来可能令大众更容易接受，在未来由非暴力运动组织社会动员时，可能会得到更好的响应。

反对阵营中的中国式夸大风格，会导致所传播的信息不符合普通民众的期待。如果公众对反对阵营不信任，那么，民间力量将难以聚集，非暴力反抗运动也无法兴起。总之，在信息流向社会公众的过程中，活动家在定性或冠名上务必谨慎，而提高理论水平将有助于提升自身的判断能力。



**裴毅然 (前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历史学者)：**人类从蒙昧洪荒走来，“强者为王”乃简单直接的集体本能。

中国民间的暴力思维，当然来自庙堂的孵孕浇铸，中共暴力政权的直接复制。被统治者的思想只能是统治者思想的回声，《三国演义》、《水浒传》都是暴力型文学。1927年“八七会议”，毛泽东那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原话“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sup>26</sup>家喻户晓！毛氏思维也来自数千年国史：公元前481年西周厉王的“国人暴动”(都城居民反抗)，前209年陈胜吴广的大泽乡“斩木为兵”……古今中外历朝历代政权更替，还不都是一个武装集团暴力推翻另一武装集团。传说中高尚的尧舜“禅让”，毕竟未得继承，未沿袭成制。

宫廷政变已是最温和、流血最少的“非暴力”。1976年10月6日揪出“四人帮”，想走党内程序的陈云，也只能同意直接抓捕，毕竟政治代价最小、可变因素最少、社会震荡最低。而之所以能一举成功，也在于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手握8341御林军。

五四时期引进“德先生”(民主)、“赛先生”(科学)，未来得及向民众详细论证何以需要两位“先生”。文明理念、文明制度，高级复杂的政治制品，程序繁缛严密的代议制，只能是近代人文产物。

生活在红色专政之下的大陆人民，只能默认暴力。一个从上到下只知只认暴力逻辑的社会，当然只能产生“以暴制暴”的直线思维，而且产生一大批依偎中共暴力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最顶级的“患者”，还认为中共的暴力恰恰体现国家的强大。

2013年，中宣部出台“七不讲”：普世价值不要讲、公民权利不要讲、公民社会不要讲，等等。这些意识形态禁锢的背后，也是暴力制裁为后盾的逻辑。中国媒体公然标示自己“党媒姓党”，只推销中共暴力的“合法性”、只维护专政秩序的“合理性”。网上出现这样的冷幽默：“中国不能乱，一乱就民主了。”

长期的信息管控、暴力的环境，难以形成“非暴力”抗争意识。不少网络简体中文自媒体，每天闪烁的暴力语言、暴力逻辑，折射了当今中国民众的暴力底色。向暴力型社会土壤移植异质“非暴力”思想，向非人性的政治文化土壤渗透人性乳液，驱逐国人的暴力心魔，需要一定培育期，需要许多人参与松土、浇灌。《中国民主季刊》发起“非暴力”讨论，所议正当时，乃中国意识形态转型的一项夯基工程。



陶业（明尼苏达中国民主基金会（MCDF）创办人）：中共在拒绝民主时说：民主不适用于中国。人们在拒绝非暴力运动时说：非暴力运动不适用于中国。两者使用了同一种逻辑：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前者使用暴力维护现存统治，后者使用暴力推翻现存统治。

中国民间暴力思想的源头，与其说与中国历史与文化的渊源相关，不如说

来自中共官方暴力思想体系更为贴切。中共搞暴力革命已经一百年了，暴力执政也有 75 年，中共的暴力革命思想早已经系统化、普及化，中共的暴力统治也早已制度化、极权化和常态化。由于中共的思想暴力和制度暴力处在强势中，以硬暴力和软暴力双管齐下；而来自历史与文化的暴力因素早就被弱化和淡化。主张暴力抗争的人士，由于曾经长期浸淫在暴力革命的教育和宣传中，其潜意识难免不受暴力思想的熏陶和革命激情的鼓舞。

近年来，非暴力抗争的推进屡屡遭遇挫折，八九民运被镇压，法轮功被镇压，维权运动被镇压，白纸运动被镇压，而极权暴力非但没有被削弱，反而越来越张狂。这一现象必然引发人们对非暴力抗争的反思。反思沿着两个不同的方向行进：一方面，迫使人们思考如何提升非暴力抗争的内涵和力度。迫切需要回答的是，甘地和马丁路德·金曾经使用的非暴力抗争手段，是否对中国人民反抗极权主义的斗争依然具有借鉴和现实意义？没有现成的答案，因为中国的极权主义实行前所未有的全面恐怖统治，是甘地和马丁路德·金从未面对过的。另一方面，迫使人们思考使用暴力：面对中共加强暴力统治和加剧暴力镇压的恶行，民间暴力的兴起具有无可非议的正当性，这是民间正当防卫的忍无可忍之举，这是民间暴力思想兴起的主要原因。但是暴力在自卫中的正当性并不表明它在施暴时具有正义性。实行恐怖统治的雅各宾派最终将罗伯斯皮尔送上断头台，那是一部革命吞噬自己儿女的历史。历史不该重蹈覆辙。

尊重历史的经验，但不应沉溺于历史，而要理性地面对现实。在暴力抗争与街头抗争之间，寻找一条积极的非暴力抗争路线解构极权制度。解构运动是我们赋予非暴力抗争的崭新内涵。解构运动分两个层面：一，解构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价值、伦理，思想和文化；利用媒体，翻墙、拆墙，



让正义之声直达墙内。二，解构极权主义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人人争当“挖土机”，深挖极权主义墙角和地基。可以预期解构运动与街头运动的叠加效应将最终根除极权主义。

非暴力抗争的力量在民间，解构运动的力量在民间。非暴力抗争并不意味着寻求渐进改革，它是一种颠覆性的斗争方式。

注释

- 1 彼得·阿克曼和克里斯托弗·克鲁格勒，《非暴力策略性冲突：二十世纪人民力量的作用原理》(Ackerman, P., & Kruegler, C. C. (1994). *Strategic nonviolent conflict: The dynamics of people power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Praeger.)  
贝尔, M., 贝思克, F. S., 和 兰巴赫, D., 《非暴力抵抗的民主红利》(Bayer, M., Bethke, F. S., & Lambach, D. (2016). The democratic dividend of nonviolent resistance.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53(6), 758–771. <https://doi.org/10.1177/0022343316658090>)  
贝思克, F. S., 和平克尼, J., 《非暴力抵抗与民主质量》(Bethke, F. S., & Pinckney, J. (2021). Non-violent resistance and the quality of democracy. *Conflict Management and Peace Science*, 38(5), 503–523. <https://doi.org/10.1177/0738894219855918>)  
塞莱斯蒂诺, M. R., 和 格莱迪奇, K. S., 《鲜花还是荆棘？非暴力运动与专制中的转型》(Celestino, M. R., & Gleditsch, K. S. (2013). Fresh carnations or all thorn, no rose? Nonviolent campaigns and transitions in autocracies.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50(3), 385–400. <https://doi.org/10.1177/0022343312469979>)  
切诺威斯, E., 和 斯蒂芬, M. J., 《为什么公民抵抗有效：非暴力冲突的战略逻辑》(Chenoweth, E., & Stephan, M. J. (2011). *Why civil resistance works: The strategic logic of nonviolent conflict*.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卡拉特尼基, A. 和 阿克曼, P., 《自由是如何赢得的：从公民抵抗到持久民主》(Karatnycky, A., & Ackerman, P. (2005). *How freedom is won: From civic resistance to durable democracy*. Freedom House. <https://freedomhouse.org/sites/default/files/How%20Freedom%20is%20Won.pdf>)  
兰巴赫, D., 拜尔, M., 贝特克, F. S., 德雷斯勒, M., 和 杜杜埃, V., 《非暴力抵抗与民主巩固》(Lambach, D., Bayer, M., Bethke, F. S., Dressler, M., & Dudouet, V. (2020). *Nonviolent resistance an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Palgrave Macmillan.)  
平克尼, J. 《当公民抵抗成功：民众非暴力起义之后建立民主》(Pinckney, J. (2018). *When civil resistance succeeds: Building democracy after popular nonviolent uprisings*. ICNC Press. <https://www.nonviolent-conflict.org/civil-resistance-building-democracy-popular-nonviolent-uprisings>)  
平克尼, J., 《从异议到民主：公民抵抗转型的承诺与危机》(Pinckney, J. (2020).

*From dissent to democracy: The promise and perils of civil resistance transition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夏普, G., 《进行非暴力斗争: 20 世纪的实践与 21 世纪的潜力》(Sharp, G. (2005). *Waging nonviolent struggle: 20th century practice and 21st century potential.* Porter Sargent.)

- 2 切诺维斯, E., 《非暴力抵抗的未来》(Chenoweth, E. (2020). The future of nonviolent resistance. *Journal of Democracy*, 31(3), 69–84. <https://doi.org/10.1353/jod.2020.0046>)

切诺维斯, E. 和斯蒂芬 M.J. 《为何公民抵抗有效: 非暴力冲突的战略逻辑》(Chenoweth, E., & Stephan, M. J. (2011). *Why civil resistance works: The strategic logic of nonviolent conflict.*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平克尼, J., 《当公民抵抗成功: 民众非暴力起义之后建立民主》(Pinckney, J. (2018). *When civil resistance succeeds: Building democracy after popular nonviolent uprisings.* ICNC Press. <https://www.nonviolent-conflict.org/civil-resistance-building-democracy-popular-nonviolent-uprisings/>)

平克尼, J., 《从异议到民主: 公民抵抗转型的承诺与危机》(Pinckney, J. (2020). *From dissent to democracy: The promise and perils of civil resistance transition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3 阿克曼, P., 和克鲁格勒, 《战略非暴力冲突: 二十世纪人民力量的动态》(Ackerman, P., & Kruegler, C. C. (1994). *Strategic nonviolent conflict: The dynamics of people power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Praeger.)

夏普, G., 《进行非暴力斗争: 二十世纪的实践与二十一世纪的潜力》(Sharp, G. (2005). *Waging nonviolent struggle: 20th century practice and 21st century potential.* Porter Sargent.)

- 4 切诺维斯, E. 和斯蒂芬, M.J., 《为何公民抵抗有效: 非暴力冲突的战略逻辑》(Chenoweth, E., & Stephan, M. J. (2011). *Why civil resistance works: The strategic logic of nonviolent conflict.*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5 切诺维斯, E. 和斯蒂芬, M.J., 《世界如何证明马丁·路德·金在非暴力问题是正确的》(Chenoweth, E., & Stephan, M. J. (2016). How the world is proving Martin Luther King right about nonviolence. *Washington Post*. January 18, 2016.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monkey-cage/wp/2016/01/18/how-the-world-is-proving-mlk-right-about-nonviolence/>)

- 6 切诺维斯, E. 和斯蒂芬, M.J., 《放下武器: 公民抵抗何时以及为何有效》(Chenoweth, E., & Stephan, M.J. (2014). Drop your weapons: when and why civil resistance works. *Foreign Affairs*, 93(4).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libya/2014-06-16/drop-your-weapons>)

- 7 阿克曼, P. 和克鲁格勒, 《战略性非暴力冲突: 二十世纪人民力量的作用原理》(Ackerman, P., & Kruegler, C. C. (1994). *Strategic nonviolent conflict: The dynamics of people power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Praeger.)

布洛赫, N., 《非暴力抵抗的教育和培训 [特别报告 394]》(Bloch, N. (2016). Edu-

cation and training in nonviolent resistance [Special Report 394]. *U.S. Institute of Peace*. <https://www.usip.org/sites/default/files/SR394-Education-and-Training-in-Nonviolent-Resistance.pdf>

肯诺维斯, E. 和 乌尔菲尔德, J., 《非暴力运动中外部支持的作用: 毒酒还是圣杯》(Chenoweth, E., & Ulfelder, J. (2017). Can structural conditions explain the onset of nonviolent uprising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61(2), 298–324. <https://doi.org/10.1177/0022002715576574>)

肯诺维斯, E. 和 乌尔菲尔德, J., 《结构性条件可以解释非暴力起义的发生吗?》(Chenoweth, E., & Ulfelder, J. (2017). Can structural conditions explain the onset of nonviolent uprising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61(2), 298–324. <https://doi.org/10.1177/0022002715576574>)

马钱特, E., 《公民运动的有利环境和民主转型的动力机制》(Marchant, E. (2008). *Enabling environments for civic movements and the dynamic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Freedom House. [https://freedomhouse.org/sites/default/files/2022-02/Special\\_Report\\_Enabling\\_Environments\\_for\\_Civic\\_Movements\\_2008.pdf](https://freedomhouse.org/sites/default/files/2022-02/Special_Report_Enabling_Environments_for_Civic_Movements_2008.pdf))

肖克, K., 《非武装起义: 非民主国家的人民力量运动》(Schock, K. (2005). *Unarmed insurrections: People power movements in nondemocracie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8 查尔斯·蒂利和西德尼·塔罗, 《争议政治》(Charles Tilly and Sidney Tarrow, *Contentious Politic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nd ed. 2015). 我是国际非暴力冲突中心(ICNC)的外部顾问, 该中心提供多种语言的免费资源, 包括中文(<https://www.non-violent-conflict.org/resource/a-force-more-powerful-a-century-of-nonviolent-conflict-2/>; <https://www.nonviolent-conflict.org/icncfilms/>, <https://www.nonviolent-conflict.org/resource/civil-resistance-a-first-look/>)

9 莫迪向鲍斯致敬: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onKo6Ab5Ec&ab\\_channel=IndiaToday](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onKo6Ab5Ec&ab_channel=IndiaToday).

10 莱昂纳德·A·戈登, 《传奇与遗产: 苏巴斯·钱德拉·鲍斯》(Leonard A Gordon, “Legend and Legacy: Subhas Chandra Bose,” *India International Centre Quarterly*, 33, 1, 2006, 103–112); 许田波, 《亚洲的文明、宗教、和平与暴力变革》, 载于保罗·拉尔森、特林库纳斯、维尔、艾默斯等人编, 《国际关系和平变革手册》(Victoria Hui, “Civilizations, Religions, Peaceful and Violent Change in Asia,” in Paul, Larson, Trinkunas, Wivel, Emmers, eds., *Handbook on Peaceful Chang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pp.239–260)

11 纳尔逊·曼德拉, 《漫漫自由路》(Nelson Mandela, *Long Walk to Freedom*,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95)

12 斯蒂芬·祖恩斯, 第 11 章《非暴力在种族隔离的垮台中的作用》, 载于祖恩斯、库尔茨和阿舍尔等人编辑, 《非暴力社会运动》(Stephen Zunes, ch. 11 “The Role of Nonviolence in the Downfall of Apartheid,” in Zunes, Kurtz, and Asher, eds., *Nonviolent Social Movements*, Blackwell, 2004, 203–229)

- 13 库尔特·肖克,《非暴力行动及其误解:对社会科学家的启示》(Kurt Schock, "Nonviolent Action and Its Misconceptions: Insights for Social Scientists," *PS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 Oct. 2003, pp. 705-712)
- 14 埃里卡·切诺维斯,《非暴力抵抗的未来》Erica Chenoweth, "The Future of Nonviolent Resistance," *Journal of Democracy* 31, 3, 2020, pp. 69-84); 玛丽亚·J·斯蒂芬和埃里卡·切诺维斯,《为什么公民抵抗有效:非暴力冲突的战略逻辑》(Maria J. Stephan and Erica Chenoweth, "Why Civil Resistance Works: The Strategic Logic of Nonviolent Conflic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33, 1, 2008, pp. 7-44; 198 methods <https://www.nonviolent-conflict.org/resource/198-methods-of-nonviolent-action/>)
- 15 林慕莲,《遗忘的人民共和国:天安门再访》(Louisa Li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Amnesia: Tiananmen Revisit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许田波,《香港的抗议:超越天安门2.0》(Victoria Hui, "Hong Kong's Protests: Look Beyond Tiananmen 2.0," *The Diplomat*, December 6, 2019 (<https://thediplomat.com/2019/12/hong-kongs-protests-look-beyond-tiananmen-2-0/>))
- 16 这项分析及引用的其余部分来自许田波,《镇压:香港面临天安门2.0》(Victoria Tin-bor Hui, "Crackdown: Hong Kong Faces Tiananmen 2.0," *Journal of Democracy*, 31, 5, 2020, 122-37)
- 17 卡里·科瑟尔和瓦莱丽·邦斯,《防波堤:俄罗斯和中国对反抗专制统治者波浪的回应》(Karrie Koessel and Valerie Bunce, "Diffusion-Proofing: Russian and Chinese Responses to Waves of Popular Mobilizations against Authoritarian Rulers,"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vol. 11, no. 3, 2013, pp. 753-68); 威廉·J·多布森,《独裁者的学习曲线:全球民主战斗内幕》(William J. Dobson, *The Dictator's Learning Curve: Inside the Global Battle for Democracy*, reprint edition, New York: Anchor, 2013)
- 18 非暴力抗争的成功有三大基本要素,即规模、战略性计划和非暴力纪律。参见哈迪·梅里曼(Hardy Merriman)文、袁飞翻译、王天成审校:《公民抗争的三大成功要素:一致、计划和纪律》, <https://chinademocrats.org/?p=69>。
- 19 例如魏京生《中国人没和平演变的运气》,《动向》,2016.10;《从林彪的政变说起》,自由亚洲,2023.09.28。
- 20 参见艾瑞卡·切诺维斯著、言晓义译:《非暴力抗争的未来》,《中国民主季刊》2024年第1期,144-165页。
- 21 参见王天成:《大转型:中国民主化战略研究框架》229页,香港晨钟书局,2012年。
- 22 《哈维尔文集》,崔卫平等译,45-78页, [哈维尔文集.pdf \(chineseopen.org\)](http://chineseopen.org)。
- 23 罗伯·哈尔维著、蔡丁贵译、林哲夫审订:《战略性的非暴力冲突》231页,爱因斯坦研究所,2009年。
- 24 吉恩·夏普著、蔡丁贵译、林哲夫审订:《从独裁走向民主》97-98页,爱因斯坦研究所,2009年。
- 25 "WUNC"四原则指有价值、团结一致、参与人数和坚持不懈,参见卡内基国际事务伦理委员会: wunc = "worthiness, unity, numbers, and commitment" <https://youu>。

[be/\\_y62wT21nBs?feature](#)

26 《毛泽东年谱(1893 ~ 1949)》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上卷,页206。



黄奕信画作